

美国亚洲战略评价

● 沈丁立

一、美国的安全战略以及威胁排序

美国的亚洲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其重要性正日益上升。一方面，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速的地区，是美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从美国对威胁的定义而言，亚洲也是当前对美国最具挑战的因素汇聚之处。美国的根本利益是主导世界。在过去六年中，布什政府认定的美国所面对的主要威胁与挑战主要来自于欧亚大陆，尤其是来自亚洲，确切地说是来自中亚/南亚、东亚和西亚。这些地方出现的国

* 本文正文原刊于《亚非纵横》2007年第3期，第1—6页。本文发表的是包括注释在内的完整版。

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问题，挑战着美国的安全利益与安全日程。

布什政府在 2002 年 9 月和 2006 年 3 月各发表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均指出了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地区冲突，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这两份报告通篇都强调了建立人类尊严和开放性社会的重要性，并借此传达美国对力量均势和对上升中转型大国的重视。^① 同期发表的美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同样指出了这些问题。^②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要确保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和贯穿全球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

美国政府如上安全认知，是“美国优越”和“美国主导”的意识形态在“9·11”恐怖事件作用下的战略应激。长期以来，美国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困扰并将打击恐怖活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但是，将反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将打击恐怖活动上升为反恐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民族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次。

美国政府的安全理念，毫无疑问地影响了民众的安全观念。据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 2006 年 10 月公布的《多国公众舆论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将“国际恐怖主义”和“不友好国

^①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ptember 2002;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2006.

^②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6, 2006.

家成为有核国家的可能”列为对美国核心利益重大挑战的第一和第二位，这与美国政府的观念接近。可以说，美国政府的“反恐”和“防扩”受到了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但是，在美国民众的观念中，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他们关心的第二位主要内容，包括能源供应、移民问题、传染病、全球变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此后才轮到朝鲜核问题。^①

二、美国安全战略的重点在亚洲

就美国政府对威胁或挑战的排序而言，目前它主要考虑的就是：(1) 反恐；(2) 防扩散；(3) 地区冲突；(4) 新兴大国崛起。关于“地区冲突”，当前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亚非，无论是国家内冲突还是跨边界冲突，亚洲的东北亚、南亚与中东地区都是世界级炙手可热的焦点，此外在非洲还有一些由种族、贫困和资源原因带来的地区冲突。在本文中，我们集中关注“反恐”、“防扩散”以及“大国崛起”这三个方面以及它们与亚洲的联系。

在反恐问题上，布什政府把反恐行动升级为反恐战争，为此制定了《国家打击恐怖战略》，投入了大量资源。^② 在美国

①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dia: Results of a 2006 Multination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2006, p. 16.

②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September 2006.

政府提出的 2008 年财政预算报告中，其军事预算高达 7165 亿美元，其中包括反恐战争费用 2351 亿美元。仅反恐费一项，即为同期我国军费的 5 倍以上。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反恐开支累计已近万亿美元。

美国海外反恐的主战场在亚洲：在 2002 年的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在阿富汗部署了 2.7 万部队，并在倒萨战争后在伊拉克部署了 13—14 万部队，占美军总数的 11%。^① 当前，美国还在南亚/中亚的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驻扎军队。

美国在亚洲反恐，必争取本地区国家在反恐上与美国合作。美国尤其重视反恐前线国家巴基斯坦的合作，为此改变了对政变上台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的态度，不再追究他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反过来对巴基斯坦政府抛弃塔里班的合作给予了重大回报，将巴基斯坦提升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国，并提供大量援助。美国以反恐为主轴，展开了对南亚的新平衡外交。同时，美国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在军事上迅速挤进中亚，既利用中亚的美军基地打击在阿富汗的“基地”势力，又在俄罗斯的传统利益区打入楔子，并图牵制“上海合作组织”内的反恐协作。

在防扩散问题上，近年来美国政府先后制定了《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以及《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

^①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4—2005, p. 23.

家军事战略》报告,^① 并先后发起了“集装箱安全倡议”(2002年)、“防扩散安全倡议”(2003年)、(美俄)“全球打击核恐怖主义倡议”(2006年)等政府间合作努力,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通过第1540号决议(2004年),提出在防扩散出口管制失效的国家境外进行第二道防御,在全球范围内严堵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②

亚洲地区集中了当前世界上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在东北亚,朝鲜2006年宣布进行了核试验,对美国的防扩散战略提出了尖锐挑战。在中东,伊拉克早被查明曾非法研制核武器,并曾秘密研制生化武器。伊朗则是当前令美国头疼的又一重大怀疑对象。美国强烈怀疑伊朗有发展核武器的意图,但又无法出示甚至取得相关证据。由于美国对伊拉克的“先发制人”军事行动存在较大的适法性问题,又由于美国反恐资源分散,目前它已深陷伊拉克而难以自拔。这样美国对伊朗马上重演“先发制人”就缺乏可信性,伊朗政府从而对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一再劝告和制裁置若罔闻。在南亚,美国出于反恐需求,已经解除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的制裁,事实上对这两个国家放弃核武器已不抱希望;对巴基斯坦曾从事核走私的严重问题也不敢制裁。美国长期以来曾推行针对印巴

① White House, *National Strategy to 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December 2002;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to Combat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February 13 2006.

② The Office of Defens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DOE, *Second Line of Defense Program*, <http://www.nnsa.doe.gov/na-20/sld.shtml>.

的防扩散措施，拒绝与这两个国家进行民用核能合作，现在美国出于战略考虑已对印度网开一面。

在新兴力量国家转型并崛起的问题上，欧亚大陆集中了“金砖四国”中的三个——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对这些转型国家的发展，美国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做法：对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布什新保守势力强烈责难其专制性，持续推动北约东扩，并将导弹防御网编织到俄罗斯家门口，实现自我预言的新冷战。美国认为中国发展势不可挡，对中国式内求发展、外修和平的成长模式无可奈何，但力图给中国发展施以束缚，并对中国以利益相关之诱压，同时营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民主共同体”制衡中国。对于印度，美国对压印弃核已不抱不切实际想法，只要印度坚持不对外扩散核武，美国就可提升印度在美国亚洲安全网络中的战略地位。

三、评价美国在亚洲的反恐战略

美国在亚洲大举反恐，得失兼有，对很多问题尚需时间来做出评判。就反恐本身而言，现在并不能确定美国或世界现在是因此更加安全了或者不是。美国挫败恐怖行动的技术能力可能增强了，但它未必显著消除了恐怖主义思潮的市场和恐怖分子从事这类活动的动机。

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具有一定的但并非是充分的法源基础。由于这场战争得不到阿巴边境地区人民的充分支持，甚至巴基斯坦政府追随美国反对塔利班的政策在国内颇受指责，美国追捕拉丹集团的行动在过去四五年中始终无法取得决定性进

展，在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使命艰难、进退维谷。

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的适法性就更差。尽管有联合国安理会第 1441 号决议先前暗示的分步式动武授权，但华盛顿毕竟没有取得后续决议对采取军事行动的明确授权。^① 美国以不那么正确的理由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留下以下四方面的复杂后果。

后果之一：彻底消除了伊拉克和利比亚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伊拉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秘密发展过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并对伊朗和本国的库尔德人使用过化学武器。在 90 年代中期，伊拉克又曾秘密恢复生产化学武器。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倒台，伊拉克新政府已经不可能再秘密从事这样的工作了。利比亚在倒萨战争前还在违约秘密发展核武器，但在 2003 年海湾战争爆发后，受到慑制决定不再继续。这两个国家完全停止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 2003 年战争的结果，

① 2002 年 11 月 8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1441 号决议。该决议声称：“给予伊拉克履行安理会有关决议规定的裁军义务的最后机会”，必须赋予“监核视委和原子能机构立即、无阻碍、无条件和无限制地”视察等诸项权力。按此逻辑，只要伊拉克方面没有完全满足“立即、无阻碍、无条件和无限制地”等条件，“最后机会”就失去。显然，这些语言和逻辑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多项条款。《宪章》第一章第一条指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的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可见，即使伊拉克方面没有充分符合上述四项要求，但只要尚未构成破坏和平或侵略，联合国安理会就不应该以失去“最后机会”变相地威胁伊拉克。但是因为第 1441 号决议这么做了，而伊拉克果然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里没有充分遵守四项要求等决议内容，因此美国依据第 1441 号决议进攻伊拉克就取得了一定的借口。

尽管那场战争本身存在严重的法律问题。

后果之二：美国形象破坏，软力量迅速下降。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被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认为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最具灾难性的，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将在几十年内难以修复”。^①与此同时，美国的硬力量投放出现内外失调，反恐与发展错位。这一切问题在2005年10月美国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被选民普遍感悟，从而导致共和党在2006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全面失利。

后果之三：朝鲜和伊朗从伊拉克战争中得出另类教训，那就是核武器的重要。美国明知战前伊拉克没有核武器，却以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进攻伊拉克。而朝鲜和伊朗与伊拉克被布什同归“邪恶轴心”阵营，要是没有核武器恐怕命运不会比伊拉克更好。因此，趁伊拉克战后美国疲于治伊之际，朝鲜和伊朗全力加紧核开发。对于朝鲜，它已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自认为可不受束缚地进行核材料积累和核试验。对于伊朗，它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可充分利用现有国际法对发展民用核能的保护，在条约内用足条件，在合法的范围边缘尽力将核能力推进到民用与军用核材料的边限。

后果之四：美国为了反恐与防扩双重之需，被迫寻求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中国抓住了战略机遇期。克林顿总统在任内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小布什总统上任

^① Senator Edward M. Kennedy, Luncheon Speech,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nproliferation Conference “A New Effectiv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Washington, D. C., June 21—22, 2004.

前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趋向于“战略竞争”。由于“9·11”事件的发生，美国对中国提出重大战略需求，需要我国在反恐和防扩散等美国所关切的核心安全领域给予合作。相应地，中美关系逐渐调整到“坦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迄今，我国已顺利完成中共 16 大提出的目标，在过去的 5 年间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期”，以后的任务是在和谐世界理念的倡导下，延长重要历史机遇期。

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摧毁“基地”恐怖组织营地，抓获在阿富汗受训的我国“疆独”分子，为这一地区的安全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利益交换，美国政府认定“东突”是国际恐怖组织，并使联合国做出了同样的认定。但美国以反恐为名，将武装力量抵近部署在我国周边地区，不能不引起我国和相关国家的关切。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再来考察这段历史，恐怕会认为布什以反恐战争和反恐战略治国，是美国在 21 世纪的根本失误。能在长时间影响国际格局的，必定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核扩散，而是大国崛起。只有大国崛起才有可能根本影响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维护美国的长期领导才是其至高利益。

四、评价美国在亚洲的防扩散战略

世界上核扩散的三块高风险地区都在亚洲。东北亚的朝鲜、中东的伊朗以及南亚的印度与巴基斯坦，均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亚洲焦点。

布什政府上台后表示十分重视防扩散。布什任内彻底消除

了伊拉克和利比亚在未来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在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美国至少现在是采取谈判方式解决，不致使局势失去控制。但在整体操作上，布什政府的防扩散政策出现了四大错误：（1）不作为；（2）对扩散失去威慑的可信度；（3）对已经成功的扩散进行战略妥协；（4）利用扩散为均势服务。

首先是不作为。白宫表现出强烈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极端仇视“邪恶轴心”国家，并且以人划线，搞起了美国版的“两个凡是”：凡是克林顿拥护的，布什阵营就反对；凡是克林顿反对的，布什方面就支持。^① 因为克林顿政府与朝鲜谈判解决朝核问题，布什政府就不与朝鲜举行双边谈判；因为朝鲜被认为对克林顿政府有过不诚信行为，布什政府就拒绝双边会谈，不再给朝鲜继续不诚信的机会。

在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的这种简单化操作，敌视和蔑视其对手，结果就是不作为，甚至是反作为，刺激“邪恶轴心”国家与美国更加对立，从而使布什政府的防扩散事与愿违，这是美国在防扩散领域的第一项失败。

其次是失去对扩散实施威慑的可信度。美国庞大的武力对任何一个潜在的扩散国家都具威慑力。但是，威慑的意义在于使其成功，而不是失败。美国的威慑政策对伊拉克是成功的，伊拉克在美国的威慑下在 2003 年前放弃了生化武器。伊拉克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即使有生化武器也不敢对美国使用。

美国在 2003 年对伊拉克的威慑成功后，完全不必使用武力。继续使用武力的后果，实质上损害了威慑。利比亚屈服于

^① 被称为 ABC: anything but clinton.

美国威慑，放弃了核武计划以策安全。朝鲜也相信美国的威慑，但采取加速开发自有核威慑的方式，寻找不依赖外部的独立安全模式。伊朗则在没有被抓到发展核武的证据之前，利用国际法对民用核能权利的保护，抓住美国暂时无暇另顾的机遇，坚持独立铀浓缩。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在军事上暂时无暇顾及朝鲜和伊朗的核发展，对它们再作“先发制人”打击的短期前景，已失可信度。美国打击伊拉克不仅刺激了朝鲜和伊朗，而且促使它们相信目前核开发是安全的。这是美国在亚洲防扩散的第二项失败。

第三，对突破防扩散成功者屡屡妥协。一旦朝鲜突破核武，美国就会迅速转变态度，就朝鲜弃核显示务实，在双边会谈和首先取消金融制裁等问题上接连接受了朝鲜的主张。美国还表示：它原先认为朝鲜具有铀浓缩的情报评估只有中等可靠度，这明显是为自己未来无法迫使朝鲜承认和销毁铀浓缩计划预做铺垫。美国从强硬过度走向理解朝鲜，既有理性务实的一面，这值得欢迎；也有无奈妥协的一面，提示着朝鲜方面对美超强硬反威慑政策取得成效，这对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抵抗政策也颇有启迪。

2007年2月13日，“六方会谈”在北京进行第五轮第三次会谈，达成共同文件，决定美国解除对朝金融制裁，并且朝鲜将在60天关闭和封存宁边的核设施，其后开始讨论核清单。这无疑是在亚洲防扩散的重大进展。但是，朝鲜在60天后没有履约，美国又称将宽限朝鲜在今年年底前兑现诺言。由于朝鲜全面弃核必须满足比“213共同文件”更多的条件，这样在布

什政府后年下台前，美国实际上将很难看到朝鲜完成弃核的前景。^①

伊朗核问题是另一个美国深感棘手的核问题。在伊朗核问题上，国际社会尚无证据表明伊朗确在发展核武，但伊朗政府也无法甚至不愿证明它过去的核发展历史的纯洁。按照伊朗在发展核武的假定，目前伊朗尚未跨越拥有武器级裂变材料的门槛，因此外部世界无法抓住伊朗发展核武的实证。在此情况下，伊朗继续保有民用核能发展的权利，似乎天经地义。伊朗的策略就是以此与美国斗争，在美国集中精力安定伊拉克的时候，加速浓缩铀的开发，在民用的保护下合法地走到军民用的边缘。伊朗可能认为：目前可以合法发展，而它一旦突破防扩散后，美国也许也会像以前对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突破防扩散那样，对它不了了之。

第四，利用扩散实现地区均势。美国实现全球主导的手段有很多，包括同盟、均势和防扩散等。我国取得核武后，美国发现这对全球范围内平衡苏联力量不无作用。20年前，美国考虑的是利用巴基斯坦对苏联的阿富汗军事行动施加压力，因此对当时巴基斯坦发展核武未予太多干涉。印度试验核武后，美国先是出于防扩散原因施加制裁，要求印度“封顶、冻结、逆转”，但“9·11”事件后，美国出于拉拢印巴反恐的需要，

① 朝鲜弃核必须达到以下四个要求，不然不能称作核裁军上有意义的弃核：

1. 给出完整的核清单，并予核实查证；2. 放弃和销毁所有军事核设施；3. 销毁所有的裂变材料和核武器；4. 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境内进行质询式监视，以防这个国家有漏报、瞒报现象。“六方会谈”第五轮第三次会谈于2007年2月13日通过共同文件，其内容仅仅涉及上述四项要求中最为浅层的内容。

便取消了对这两个国家核武发展的制裁。近来，美国又出现了利用印度的核发展牵制中国的战略动向。

美国现任国务卿赖斯是这一战略动向的策划者。在她和她的谋士们看来，印度的核武发展已不可逆转，但对美国友好的民主国家的核武器，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① 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是核武器向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与地区扩散，以及地区和全球性新兴强权的兴起。因此美国需要与民主、友好的地区性大国合作，防止中国提出挑战。为此，美国理解印度的发展和大国诉求，并愿意协助印度实现在核能和航天等领域的科技进步。

为此，美国不惜修改国内法和修改由它自己提出的“核供应国集团”等防扩散机制，也要实现美印民用核能合作。美国提升印度民用核能水平以及新世纪美印战略关系，却要付出损害防扩散的重大代价，反映了防扩散和防大国崛起在美国安全地位中相对顺序的改变。^② 说到底，美国可以接受在它观念中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取得核武器及其崛起，甚至以此作为手段来

① Ashley J. Tellis, *Atom for War? U. S. — India Civilian Nuclear Cooperation and India's Nuclear Arsenal*, 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report, Washington, D. C., 2006.

② Zia Mian and M. V. Ramana, "Feeding the Nuclear Fi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August 27, 2005; George Perkovich, "Faulty Promises: The U. S. — India Nuclear Deal," *Policy Outloo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2005; Michael Krepon, "Is the U. S. — India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 good or bad for proliferation," *PacNet* 37A, Pacific Forum CSIS, September 7, 2005; Robyn Lim, "U. S. makes a bad deal with India", *PacNet* 37B, Pacific Forum CSIS, September 8, 2005.

牵制其他大国的发展。这种过分务实和功利的做法，其实并不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及其价值观的推广。

五、评价美国对亚洲崛起大国的战略

欧亚地区不仅见证了日、韩等工业化国家在战后的成功崛起，而且正在目睹着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印度等新一代地区性大国的快速发展。按照多数预计，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和印度均有可能在 21 世纪中叶之前超过美国，甚至还可能大大提前，这是美国的战略家们十分担忧的。

这种前景是完全存在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使得后发国家的劳动力或者自然资源都可能成为输出性发展资源，而资本大国为了获取更多资本增值，也可能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与前者进行利益交换，其结果就是双方交换生产要素，更快地合作发展。这种局面是冷战期间不曾具有的。按照人民币的官方汇率，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而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经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二，美国中央情报局近年来也连续就此做出评估。^①

对此，美国在冷战后不断思索对亚洲崛起大国的新政策，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已开始整体运行一套定位明确的亚洲新均

^① 中情局的国力评估数据为：2005 年，美国 PPP 为 12.4 万亿美元，中国 3.9 亿美元，为美国的 72%；2006 年中国则上升至美国的 77%。见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rankorder/2001rank.html>。

势说，其中有三项内容：对日本，强化战略同盟关系，理解日本的正常化和大国化，利用日本作为美国应对东亚安全的前沿基石；对中国，通过经济合作增进中国经济的市场自由化，促进中国向民主法制多元体系的和平转型，以利益相关诱压中国分担更多国际责任，以维持现状争取在台湾问题上的更长战略机遇；对印度，重新认识它在美国价值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印度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的均势地位，加强南亚和中亚在美国亚洲框架中的战略地位。

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是以美、日关系为基础的亚洲同盟体系，包括美国与韩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等传统友邦的军事关系。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日本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持续上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日同盟关系开始升级，日本被赋予更多的军事作用。同时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与扩散，美国开始调整其在亚洲的军事部署，在日本美军数量下降，战斗力增强。美国兵力部分收缩至关岛等地部署，给了它更多安全进退的机会。美、日十多年来的这种关系，在近期还将延续。

美日关系是美国亚洲利益的保障，而中美关系则对美国具有双重意义：它既可能是美国持续繁荣和安全的来源，也可能是由此美国接受中国在低平台上更快速发展的后果，并导致对美国既有权力的更多分享抑或削弱。这两者相辅相成，美国不可能选择前者而不面对后者。

一个价值观体系与美国不太一致的国家去和平地分享美国的权力，对美国来说既痛苦又新鲜，这就是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时期辩论对华政策的原因。经过诸多尝试，总体上美国已经形成一定的两党共识，那就是采取“接触+塑造+防范”的政

策，这体现了务实的现实主义，也反映了美国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政策选择。

美国的对华务实和新世纪的全球反恐，扩大了双方的合作机遇。中方尊重美国的合法关切和核心诉求，在国际法原则下开展与美国的互利合作，扩大两国在广泛的国际事务上的协作，尤其是在反控、防扩散以及稳定地区形势方面，起到了更多的积极作用，承担了更多的国际合作，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合作伙伴。这是我国塑造一个对华合作的美国和一个和谐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就。

美国与印度的关系同样有它的前景与局限。美印双方互有需求，也有矛盾。美国对印度的利用，印度心知肚明，但是印度在战略成长中有求于美国，尤其是在大国化的过程中需要美国的支持。然而，印度有其独立外交的传统，对外国的影响十分防范，对地区和全球均势有着自己的看法。印度的利益是借力发展而不是失去独立，印度的利益是成为全球性大国，而不是从属于超级大国的大国，这就是美印关系的局限，也是全球政治多元化发展的积极因素。

六、结 语

美国在新世纪的主要利益与亚洲息息相关。亚洲支撑着美国的资本扩张和高科技人力需求，向美国提供了大量的能源和劳动力资源。同时，亚洲又是目前美国国家观念中的核心威胁来源。因此，美国在反恐、防扩散等方面也投入了空前的资源，以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犯罪以及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挑战。

美国确实面临着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地区冲突以及新兴大国崛起等一系列传统与非传统挑战。但是，布什政府对这些问题的排序以及应对，出现了大量混乱。

总体上说，美国过去几年的亚洲战略乏善可陈。关键在于美国政府办事不够依据事实，而是将信念宗教化，对具体事务缺乏理性判断，政出多门，政出低效。美国追求的目标与其实力出现偏差，这也造成了美国外交资源不足，面临多层次挑战时只能采取挖东补西，在阶段性促进某一方面利益的同时，长期性地损害其他方面的利益。

作者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

- 丁幸豪 上海美国研究所
- 王义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王鸿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 刘永涛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孙士庆 上海大学军事教研室
-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 李淑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